



中日关系史第四次学术讨论会

中日
关系
史
论文
集

辽宁省中日关系史研究会

1984.9

前 言

这本集子所收的二十六篇文章，不是选编，其中多数还是一九八三年十月锦州会议时的论文，另有几篇是部分作者于本次讨论会前临时写就放到本集的。

这本文集，其内容涉及的面较宽，上下断限也较长，在编辑过程中都没做改动。我们想，学术问题还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好，至于说文字与内容，也可能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对此只能是文责自负了。

我们深切地希望专家、学者和史学同仁提出批评意见，以推进辽宁省中日关系史研究工作的健康发展。

一九八四年九月

目 录

从日本唐式建筑风格看中日文化交流·····	孙德昌 (1)
旅顺大坞的兴建与北洋水师	
根据地的形成·····	曲传林 翟云瑞 (12)
论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毅军·····	刘 谦 (23)
甲午中日战争时期东三省练军琐谈·····	刘树泉 (32)
简述甲午中日战争时辽东战场清	
军后勤的几个问题·····	潘国华 刘玉岐 (43)
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实行	
奖惩办法初探·····	关 捷 金长奇 (73)
甲午中日战争期间东北人	
民的抗日斗争·····	刘玉岐 潘国华 (102)
甲午战争期间辽宁人民自发	
抗日斗争述略·····	孙克复 (116)
翁同和与中日甲午战争·····	李俊山 (133)
刘坤一与甲午中日战争·····	关 捷 (142)
李秉衡与甲午战争·····	张作宪 (160)
中日甲午战争中的聂士成·····	董守义 (176)
甲午中日战争中的左宝贵·····	杨玉奎 (189)
从中日甲午之役看李鸿章的误国外交·····	任鸿章 (194)
李经方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的两	
桩罪案述略·····	关 捷 高美雁 (212)

在日中（甲午）战争中日本是以“人”取胜的	
.....（日）安井久善 赵成材摘译	（224）
关于对旅顺几处日俄战争遗址的考察.....	周祥令（228）
日俄战争在抚顺.....	李长月 赵振寰（235）
简论日俄战争及对抚顺煤矿	
的争夺.....	王渤光 刘寒松（247）
日俄战后中日双方关于抚顺矿权	
归属问题交涉始末.....	薛景元 刘星义（258）
试析旅顺东方会议.....	张志强 徐建东（275）
老北风和他的抗日义勇军.....	潘喜廷 魏福祥（282）
马占山反正后与日本决战述要.....	王秉忠（296）
略论“七七”事变的起因	
——兼评“中国方面打第一枪”之说.....	易显石（307）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南京惨案.....	毛敏修（326）
战后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的设立.....	吕永祚（336）

从日本唐式建筑风格看中日文化交流

孙 德 昌

每当我们谈及日本唐式建筑时，总是选择那些具有代表性的，典型的唐式建筑物。经过分析、对比、综合来看日本古典建筑及发展沿革和移殖成果的。所谓日本古典建筑大体上分大和以来的神社建筑物和佛教传入日本以后的佛教建筑物两种形式，二者即独立存在又和谐统一构成日本民族化的典型特点。诸如京都、大阪、东京、神户、奈良等地方的庙宇、寺塔、书院等保存至今的日本古典建筑物。

日本民族是伟大而又善于学习的民族。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以前就奠定了这一基础，为发展本民族文化，大量地、多极地、有选择地、并发扬有益部分，形成一定意义上的新的文化。日本建筑艺术也和其他艺术一样，是在吸收外来艺术影响、融合并加速发展本民族特点、构成新的民族风格的。

尽管历史上建筑差异性受时代，生产水平，地理条件、气候条件、建筑材料的生产和生活习惯，乃至宗教信仰、美学观点诸因素影响，因此表现了各自特点。到过日本的朋友们，无不为日本的庙堂、寺塔、城堡建筑所吸引，观赏之余，不免追溯到其发展、沿革的历史。首先联想到的就是中国唐朝。七世纪的唐朝已发展成为东方强盛的封建帝国，八方来朝，此间日本封建社会刚刚确立，因此以唐朝为典范，取

法上国成为日本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开国时代的奈良朝，全面的学习唐帝国，并取得明显的成就。随着佛教的传入，日本“建筑艺术有长足的发展”①佛教建筑和造型艺术也得到推广，中国的寺塔、城廊建筑、佛象雕塑、壁画书画艺术和石窟等广为日本人民所吸收，“正是佛教作为国家统一的思想手段发挥了作用”②所以佛教成了为日本中央集权统治服务的国教。影响所及语言、文字、印刷、艺术、服饰、音乐、舞蹈、医药学，岁时节令以致风俗习惯，都带上浓厚的宗教色彩。

我国建筑构造特点以阶台、砖石、柱、梁、浮柱、栋、桁、斗拱飞昂等为骨体，墙门次之代表为寺、塔、石窟之类。唐代木结构建筑已达相当成熟的程度，佛教建筑日增，单体建筑的屋顶坡度平缓，出檐深远，斗拱比例较大，柱子较粗壮，多用板门和直棂窗，多采用回廊式，主体建筑置于中部，四周用矮廊围起，整体建筑风格庄重朴实。奈良唐招提寺落成正是这一建筑特点的反映。据查，唐招提寺的设计和营建多出于如宝、东渡弟子和工匠之手，乃为日本第一座唐式建筑物。其金堂（即大殿）建筑用列柱、鸱尾、三层斗拱形制，技法，结构，精巧别致，大殿面阔七间进深四间，前后有廊，正面中央开间柱头斗拱用六铺作，偷心造。梁枋斗拱都有彩绘，是代表唐代建筑风格的一组典型建筑物，气势不凡。建寺同时又把干漆法造像传给日本工匠，后来干漆法盛行日本，俗称此法为唐招提派。其他如西大寺的塔出于思托之手，可见唐风影响之广之大，洋溢奈良城。

世界上任何一个古老民族都有其图腾崇拜和宗教信仰的，六世纪以前。奴隶制时代的日本民间流传一种自然神教，

又称神道教，崇奉神灵的建筑物为神社。进入封建社会，佛教的传入并宣布为国教后，神道教和神社建筑物与佛教建筑物并存，至今不衰。有名的如三重县古老的伊势神宫（即皇大神宫）、京都的北野神社、广岛的严岛神社（日本国三景之一）与庙宇建筑的法隆寺、东大寺相媲美，互相影响，构成日本“和式”特点和风格。日本佛寺建筑受中国影响之大，是因“唐式”建筑被很好的吸收和发扬，京城建筑更为突出，宫殿、住宅、茶室、书院和园林等。

六世纪末，日本正值飞鸟朝时代，寺院建筑，依照“唐代平面布置之基本观念，为四周围墙，中立殿堂、围成或作为回廊，每面正中或适当位置辟门，四角建角楼”和“佛寺正殿以前亦有以塔与楼分立左右者，如一一七窟五台山图中‘南台之寺’，其实例，则如奈良之法隆寺”，③成为这一时期建筑艺术的精华，闻名于世。同时又建筑了“四天王寺”、法兴寺等大型官寺，其平面布置亦如唐代山西五台山、南禅寺、佛光寺、五龙庙、天台庵等寺院建筑，有山门（唐门），为整体建筑增色的山门，在日本有京都、西本愿寺之唐门，新药师寺之便门、二条城唐门，丰国神社唐门等等。钟鼓楼、殿阁三重（日本称本殿为金堂或拜殿）辉煌壮丽名刹大寺，实为古代中国、朝鲜、日本艺术大师们精心合作的产物。“唐代建筑之基、殿身、庭顶三部分，至今仍为中国建筑之首、身、足。其结构以木柱（列柱）构架一仍其制”。④这直接影响日本之宫殿，官衙和公共建筑物，其中世俗化的寝殿造尤为突出，以平等院凤凰堂为代表，是唐式建筑登峰造极之作品。

八世纪重要庙宇集中在当时日本首都奈良（710～794年

为都城，又称平城京），日本政府下令全国各地营建佛寺四百多座，其著名的大寺院有难波（今大阪）“金光明四天王护国寺（六〇七年建）即国分寺，法华灭罪寺即国分尼寺，尤其奈良朝营建的法隆寺（六〇七年建）、旧药师寺（七三〇年建）、东大寺（七五一年建）”⑤为典型的“唐式”建筑，全寺以金堂为轴线，东西两侧为塔，讲堂在北回廊正中，占地较大，其中东大寺金堂，面阔十一间，进深七间，二重，通高四十八公尺，气势雄伟，乃日本金堂之冠，久负盛名。系“唐式”与“天竺式”和谐的反映，七五二年又铸成了日本国最大佛像，仿东都洛阳龙门武后所建奉先寺的卢舍那佛趺坐像，通高十六公尺，重达五百顿的东大寺铜佛，为日本铜佛之冠。东大寺佛像雕塑及壁画，生动形象，技法纯熟，巧妙的吸收中国、印度佛教艺术的成就，表现了唐代艺术的独特风格，也可以说是南北朝敦煌石窟、印度阿旃陀窟艺术的交相辉映，微妙结合所形成佛教艺术的日本化。此即为唐代艺术东传的代表，也是佛教艺术东传的丰硕成果，反映这一时期的殿堂、楼阁、佛塔、城廊、桥梁、石窟等一仍唐朝法式，是日本佛教及建筑史上的光辉时代。

十世纪前后，日本建筑向着民族化、世俗化方面发展。为加强中央皇权统治的要求，在寺院中遍建阿弥陀堂，平面布置为一正两厢式，中间用廊子联结，习称“寝殿造”，以适应教徒们燃起香火，敲响钟磬和木鱼子，有如演戏一般召集和尚们高声颂读经文的宗教活动场所。其格局，气魄小于中国唐朝，这一点正显示出，构成日本建筑艺术的“洗练、简约、优雅、洒脱见长”⑥的风格，日本阿弥陀堂典型代表，即京都的平等院之凤凰堂（一〇五三年建）。

在城廓建筑上日本平城京(今奈良)全仿唐都城长安，可谓长安城的翻版，奈良古城，南北约4.8公里，东西约4.3公里，东北部还有一个类似长安城大明宫的“外京”，正中一条朱雀大路，把城市分为“左京”和“右京”两部分，各有四条南北大路，东西大路共九条，这样东西南北交叉的方格子为“坊”的是居民区。又被纵横三条小路分成相等的十六个町，每町大约一万四千四百平方米。

日本佛教建筑艺术至隋唐而盛极，唐长安城内“寺殿崇广，为都城之最”，且“大兴佛殿、制度与太庙同”⑦如大兴善寺，大慈恩寺为会昌灭佛时下诏留存，才得幸免于难而被保留下来。可见还是有选择地重点保留一些佛教建筑物。日本亦然，在奈良广建寺庙，如旧药师寺、法隆寺、东大寺等。“左京”、“右京”各有一处市场，也称东市和西市，朱雀大路北端是平城京的宫门，又叫朱雀门，进朱雀门是中轴线上的朝堂院，院以北是皇宫，又称内里。宫城里布满了中央政府和各部门的建筑物。“当年唐招提寺讲堂是七六〇年从朝堂院迁来的东朝集殿，面阔九间，进深四间，原建为悬山式，后改为歇山式”⑧此为平城京唯一留下来的“唐式”建筑物。

七八四年放弃平城京，另建新京于长岗县，据载未完成。七九三年在京都建平安京(今京都)，直到明治维新，再未迁都。清水寺本堂建于七九五年，修建在悬崖峭壁的道沿上，前院和侧翼建在六层高的木构架上，俗称“舞台造”，类乎中国山西交县的悬中寺。

皇宫建筑反映日本建筑的俭约素净，屋面用桧木树皮，梁枋斗拱皆用白色，地板用木本色(不涂饰)总体说来样样

仿唐长安城及宫殿建筑（唐代诸帝建离宫如：仁智宫、九成宫、华清宫；日本亦模建，只是叫御所而不叫离宫或行宫罢了）。日本皇宫有十七殿，七舍，其间由廊庑联接，如紫宸殿为政殿，清凉殿是天皇日常起居理政的场所。常宁殿是皇后居室，贞观殿是皇后理政之所，可见日本皇宫的命名和使用尽效唐朝，皇宫建筑组群亦然。遗憾的是平安京在十二、十三世纪全面战乱中毁于兵火，尚未修复。其不易保存是与日本国处地震带及大量地使用木材建筑有关系的。

除京城之外也造了几座仿唐花园、林苑。有名的如南苑、西池宫、松林苑、乌池塘“穿池起苑，以盛禽兽”⑨穿池引水，构筑假山，追求自然风貌，形成日本造园的独立的专门技术。较全面且完整的园林如神泉苑、嵯峨院、朱雀院、云林院、乌虹桥、廊、亭等建筑错落其间。以自然见长，情趣横生。

佛塔建筑，其初虽多木构筑，阁楼式塔的平面唐代为方形单层塔壁，中空，内部呈筒状。最早为十三层，个别有十五层的，一般七层、九层。木构造塔这正适合当时日本木材多的优点，法隆寺五重塔，为正方形，木构造，属典型的“唐式”方型塔之建筑。此塔内有一中心柱，高32.45公尺，其中相轮高约9公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⑩出檐很大（底层出檐4.2公尺），远望此塔仿佛是屋檐重叠，兰天浮云，看去非常轻快，飘逸，游人流连忘返。金堂与塔斗拱在外檐用云拱、云斗，采用偷心造，从此形成日本建塔的主要特征了。影响所及“奈良室生寺五重塔、药师寺三层的东塔”⑪全木构造，方形基座，恰似唐朝长安之大，小雁塔（方塔）是为法隆寺五重塔的延续和发展。

今天一些外国人尚把中国人直呼为唐人、汉人，究其原因就是汉唐时代文化、经济发达，对世界影响深远之故。因“汉威令行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国为汉，唐威令于东南，故东南呼中国为唐”^⑫所以日本人习惯上又把五重塔叫唐塔，佛寺山门叫唐门。再看“东大寺金堂建筑，在外观上也使正脊屋顶，鸱尾和殿身各间构成和谐的比例”^⑬诸如内外槽间的柱枋与佛像的视线关系处理得恰好使佛像、背光收入视野中，佛像高于柱高，加上佛台低矮，无形中增大了佛像的尺度，给人以深邃感。把斗拱与柱高的比例处理为1：2再增加出跳达4次，这样一来，整个金堂屋檐挑出在4公尺上下，相当从檐口至台基面高度的二分之一，加之屋顶采用1：2和缓坡度。使观者站在殿前看不到屋面，显示出完好的建筑立面效果，突出斗拱的地位，发挥了斗檐的艺术作用。因斗拱用材量大，日本有条件全面吸收，再现唐代建筑稳健雄丽的风格。

从日本平安朝以降，经镰仓时代的书院造，室町时代的茶道的发展，又有金阁、银阁建筑物很浓的世俗气，桃山时代西本愿寺、丰国神社唐门（为日本国宝），江户时代的华族会馆的黑门（国宝）直至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历一千多年，唐代建筑的日本化举不胜举。

中日文化交流史贡献较大的是日本遣唐使团，中日双方的僧人学者，是他们学习、继承和发展了中日文化。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间的友好往来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自秦至隋已奠定往来的基础。日本铜铎与秦时的古钟相似，出土文物中，有王莽时代货币。五十七年日本使节来东汉，光武帝赐印绶一，此件在一九八四年出土。六〇〇年推古女皇派使臣来华。六〇七年又派小野妹子来华，后又有高向玄

理等人来华。到了强大的唐朝，为中日友好开创了繁荣的时代。唐太宗贞观四年（六三〇年）至唐昭宗乾宁元年（八九四年）间，日本先后派出“遣唐使”达二十五次（含民间非正式使团），使团人员有时竟达五百余人，其中最著名的阿倍仲麻吕（中国名字晁衡）、吉备真备、空海、园仁等人，在中日关系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在较长的历史时期，日本系统地吸收中国科学文化，其中“遣唐使”的作用为中日两国人民所称道。

“遣唐使”多数是留学生和学问僧，一方面是学习唐朝典章制度和学术文化、科学技术，琴棋书画，一方面是朝贡和贸易。据载日本入中国（进口）有木材、硫磺、砂金刀、漆器；中国入日本（出口）丝织品、文具、书画、瓷器、香料、药材。现在日本正仓院中还藏有唐代纺织品、铜器、木器、文具、祭器及生活用具，它已成为珍贵纪念品了。中国的铜钱在日本大量流通，据出土发现有“开元通宝”数万枚之多。一九七〇年十月西安南郊出土两瓮唐玄宗朝遗物，其中发现五枚日本银币，圆廓方孔，钱文为“和同开珍”说明日本钱币也流入中国。

六至七世纪的日本社会，正是大变革时期——从奴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发展阶段。大化元年（六四五年）中大兄皇子（孝德天皇）、中臣（藤原）镰足，消灭了苏我氏，取得了政权。推行一次重大的政治改革，史称“大化改新”。从此，日本国结束了奴隶制社会阶段而进入封建社会时期，经多年混战，终于统一了日本并转向中央集权的天皇制国家。大体上经历了与唐帝国并行的日本国之飞鸟、奈良及平安三个朝代。日本“遣唐使”团不远万里跋涉，漂洋过海前来中

国虚心学习，这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只有重视科学文化，且从善如流，勇于和善于吸收先进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为己所用，才能有力地推动本国人民文化的发展。同时要克服民族虚无主义和国粹主义。反映在政治上仿行郡县制，经济上行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制等等，不一而足，日本国发展的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扬州大明寺（法净寺）法师鉴真（六八八——七六三年）年）、江阳人，俗姓淳于。十六岁出家当和尚，十八岁受菩萨戒，二十一岁受具足戒，三十一岁后讲授《四分律》、《律钞》等，修三学，博达五乘，造立寺舍，塑造佛像，缝纳袈裟，尊称受戒大师，应“遣唐使”团学问僧荣睿、普照邀请，六次东渡，五次失败，终于在唐天宝十二年（七五三年）达日本都城奈良，备受僧俗欢迎。随同者：扬州白塔寺法进、大清寺法师等，道俗总共二十四人，并将如来舍利、经像、律论、疏章随身衣物”⑭此外尚有二王（羲之、献之）书法真迹，传入日本后造就了日本“三笔”（嵯峨天皇、空海、、橘逸势）。以空海（原名佐伯真鱼、谥号弘法大师）为最，一说空海当年拜唐书家韩方明为师，加之精研书法，能书篆、楷、行、草、隶五种书体，故有“五笔和尚之称，开日本之先河，一代书道新风。人云：今年日本京都大学拟举行弘法大师一千一百五〇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学者王利器先生为《文镜秘府论校注》进行交流。

鉴真法师达日本后，受到天皇的礼遇，“于宝字三年八月一日（七五九年）私立唐律招提名，后请官额，由日孝谦天皇依此为定⑮开始营建招提寺（唐肃宗乾元二年（七五九年）收归为官寺，受“赐田七十三町，封户五十”⑯从此唐

招提寺成了律宗的祖庙，日本律宗为鉴真所创，今天日本律宗以他为开山祖，以唐招提寺为本寺，唐招提寺金堂代表着中国唐代纪念性建筑的风格，其雍容大方、气势不凡为世人所公认，近代日本学者安藤更生：“鉴真是站在奈良文化最高峰的人，同时也是替以后平安文化开道的人”。足见中国鉴真大法师对日本奈良时代文化的影响至深，奈良时代是“醉心于唐朝的先进文明而敢于进行冒其生命危险的航海，学习上的积极进取的气魄”时代^{①⑦}再一点就是因为日本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而中国有“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①⑧}

鉴真大法师在东大寺为圣武上皇、光明太后、孝谦天皇（女帝）等授戒，日本戒坛院成立时由鉴真担任戒和尚，授具足戒，因此扬名日本国。鉴真大法师七十六岁（七六三年五月六日）结跏趺坐寂于唐招提寺宿房。七七七年日本第十四次“遣唐使”入唐，副使小野石根达扬州时，传达了鉴真大法师示寂的消息，唐僧俗云集龙兴寺尽著丧服向东（日本方向）举哀三日，以表悼念鉴真大法师。七八〇年唐使者高鹤林东渡拜谒鉴真大法师遗像，为一二二〇年前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伟大使节的历史贡献的鉴真大法师、和一二一三年前（七七〇年）在长安逝世的阿倍仲麻吕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继“遣唐使”之后的今天，奈良与西安两座古城，已结成友好城市正发挥历史作用，现今日本，古代建筑物中唐风之盛为人所公认，今天日本是较发达的国家之一，然而从上述历史上看却经历吸收，学习唐朝的优秀文化的历史过程”日本人民是好学的，勇于进取的，为日本民族引以自豪的，

也是中日两国人民共同智慧的结晶，让两国人民友好传统代代相传，为“建立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使二十一世纪成为中日关系更加友好的世纪”，^⑭愿中日两国人民伟大友谊万古长青。

引文目录

- ①《住宅读本》平尾善保，第九页
- ②《日本哲学思想史》永田广志，第十五页
- ③《中国建筑史》梁思成，第六十四页
- ④《中国建筑史》梁思成，第六十四页
- ⑤《日本建筑史图集》日，新订版
- ⑥《外国建筑史》陈志华，第二六二页
- ⑦《长安志》
- ⑧《外国建筑史》陈志华，第二七一页
- ⑨《日本书记》
- ⑩（《后汉书》·陶谦传）
- ⑪《日本建筑史の研究》日，一九四三年
- ⑫《萍州可读》卷一
- ⑬《奈良时代の研究》日，一九六〇年
- ⑭（《唐大和上亲征传》·鉴真和上三异事）
- ⑮⑯《唐大和上东征传》第九十四页
- ⑰《日本历史》井上清
- ⑱《中国科学技术史》李约瑟
- ⑲赵紫阳总理对日本前外相宫泽讲话，《人民日报》。

旅顺大坞的兴建与北洋水师 根据地的形成

曲传林 霍云瑞

北洋水师的成军应是中国近代海军形成阶段，而旅顺大坞的兴建为北洋水师的发展建立了一个巩固的根据地。本文试将旅顺大坞作为北洋水师根据地的形成过程作一个概括地叙述

一八四〇年资本主义列强用鸦片和炮舰敲开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在资本主义列强的坚甲利舰面前，清王朝封建统治者的上层惊慌失措屈膝投降，而一些有远见卓识的官僚如林则徐和一些爱国主义知识分子魏源等人，他们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办法，与资本列强相抗衡，但不为上层统治者所重视和采用。林则徐为了抵抗侵略而“捐资仿造西船”的正确主张，反被道光斥责为“一片胡言”。结果，鸦片战争以屈辱投降而告终。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横扫一切封建势力，使腐朽的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时封建统治者不惜出卖民族利益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企图借助于洋枪洋炮来镇压农民起义军。一些洋务派如曾国藩等人为加速镇压起义军与壮大自己的派系力量，也曾多次向清政府建议购买外国舰船。他说要“攻取苏、常、金陵，非有三支水师，不能得手”。①还说“东南贼氛蔓延，果能购买外国良炮，剿贼必

能得力。”②“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③李鸿章为了壮大其派系的实力，极力主张创办北洋水师。他在一八四七年筹议海防折中说：“凡与滨海各国战争者，若将本国所有兵船径往，守住敌国各海口，不容其船出入，则为防守本国海岸之上策。其次莫如自守，如沿海数千里敌船处处可到，若处处设防，以全力散布于甚大之地面，兵分力单，一处受创，全局失势，故必聚积精锐，只保护紧要数处，即可固守。……是以中国造船之银，倍于外洋购船之价。今急欲成军，须在外国定造为省便”。④李鸿章提出的造船不如买船的论点，曾遭到一些顽固派的反对。有的人则直接指责李鸿章创建海军不是为了卫国而是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好与朝廷分庭抗礼。尽管遇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和清政府在财政上的极端困难，李鸿章还是坚决地主张：“欲求自强，仍非破除成见，定购铁甲不可”。筹办水师的议论，最后由总理衙门在一八七五年作了总结。决定每年从关税和厘金项下拨出四百万两作为南北洋海防大臣沈葆楨、李鸿章筹办海军经费。并议定“先就北洋创设水师一军”，然后“就一化三”，计划在十年内建成南、北、粤三洋水师。第一批购进的外洋舰船是英国制造的蚊子船，其中二十六吨半的两艘，于一八七六年六月十九日从英国的纽喀斯尔、秦因启碇，经五个月的航行，于十二月二十二日抵达天津，李鸿章将其命名为“龙骧”、“虎威”。另外三十八吨的两艘于一八七七年三月一日，从英国军港普里茅斯启碇，于六月二十五日驶抵福州，李鸿章命名为“飞霆”、“策电”，交由船政大巨吴赞诚派员操练。继而又经李鸿章之手为南洋水师定购四只炮舰，经沈葆楨命名为“镇东”、“镇西”、“镇